

臺灣語言與文化的再中國化 ——戰後的分期試論

高焜源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語言與文化的再中國化

——戰後的分期試論

高焜源

摘 要

「去中國化」的相關政策，是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以來最被批評的政策之一。「去中國化」的出現，與「臺灣意識」的抬頭是高度相關的。若沒有「中國化」的進行，當然就沒有「去中國化」的必要。所以，要討論「去中國化」的問題，必然的，要先釐清「中國化」在臺灣的演進。就歷史來看，「中國化」在臺灣已有相當的時間，至晚到明鄭時期（一六六二～一六八三年）就已經是大張旗鼓的時代，這是因為之前的臺灣是由荷蘭人統治，鄭成功以中國漢族聲討回來，當然是要進行一番文化改革運動，例如提倡儒學就是其中之一。後來，在清朝統治時期（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隨著移民的增加，中國文化的移植也愈來愈盛，臺灣的「中國化」進程也變快了。由此看來，國民黨統治臺灣以前，臺灣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已經很深，是不容否認的事；不過，二次大戰結束之前，五十年的日本文化的浸染，也不容我們忽視。因此，在去除「異族文化」的要求下，戰後的「中國化」運動，只是延續以前的相同政策而已，對象是從原住民轉移到漢族。

關鍵詞：中國化、再中國化、去中國化、臺灣儒學

Sinicizing Taiwan Again

— Discussion of the installmen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Gao, Kun-Yuan

ABSTRACT

The "desinicize" policy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ized policies since 2000. If there was no "sinicized", of course, there would be no "desinicize" necessary. Before 1895, taiwan culture has sinicized at least two hundred years (1662~1895). When Japan government came, the "desinicize" began certainly. The KMT's "sinicized movement"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ame policy before. This paper just tries to analyse the policy in each stag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know how the taiwan culture to be forming, and what it has included.

【Key words】

sinicize, desinicize, Taiwan culture, Taiwan language

一．前言

臺灣在經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之後（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又回到中國人的統治之下。為了消除日本統治所留下的文化，「中國化」是國民黨當局必然的措施之一。也因為有這些「中國化」的措施，才会有日後的「去中國化」的疑慮與爭議。

「中國化」要怎麼定義呢？中國國民黨最初退到臺灣的時候，一心想「反攻大陸」，以中國正統自居，當初國際強權也以承認國民黨政府者居多。後來國民黨漸漸發現無法如願，就只能在形式上把臺灣的環境裝設得像中國，而承認中共的國家則與日俱增。後來因為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興起，所以臺灣就興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臺灣的中國化的進程達到高潮；諷刺的是，國際上的承認度卻背道而馳，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正式與中共建交，臺灣正式被國際完全否定具有中國的代表權，也就是不再具有中國的正統地位。臺灣也沒有順勢宣佈與中國完全斷絕關係，依然維持中國化運動，以便將來統一。不過，這些活動在威權體制下，並沒有幾個人會有覺得不妥的地方，更不用說要提出「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的相關政策，是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以來最被批評的政策之一¹。但是，所謂「去中國化」，是否即針對臺灣內部的「中國化」進行完全去除的工作呢？其動作是否就如同當年南韓、越南取消「漢字」一樣呢²？其實，就目前所爭議的問題看來，當今臺灣的「去中國化」情況可能比不上韓國，更

¹ 此現象在政黨輪替以前就被強烈批評質疑過，呂正惠說：「近二十年來，當中國半世紀以來獨特的現代化工程終於「浮出」表面，開始引起世人注意時（不一定是完全善意的），臺灣卻表現了『去中國化』的重大傾向。……臺灣因此可以保持他的『利益』、他的『文明進步』於不墜嗎？」呂正惠：〈跨世紀臺灣文化發展的展望〉，《跨世紀臺灣的文化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入黃俊傑、何寄澎主編：《臺灣的文化發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版。），頁198。黃麗生說：「臺灣部分人士不察於中共政權打壓中國文化的背景，也不願深思『中國』與『中共』之別，爲了反對中共政權併有臺灣，乃一味使臺灣非中國化，並強烈質疑具有中國身份的『中華民國』體制。」黃麗生：〈正史中分裂時代的「中國」〉，《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夏潮基金會主編（臺北，海峽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頁202。

² 從1970年起韓國小學、中學教科書中的漢字都被取消。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前，韓國政府還曾下令取消所有牌匾上的漢字標記。1999年，金大中總統下令部分解除對漢字使用的限制。韓國人找到的解釋是，就像使用拉丁字母的國家各有各的本土文化一樣，朝鮮半島先輩的漢字文化也屬於朝鮮本土文化。後來，中醫、豆漿等東西都被韓國人宣佈是韓國的祖先發明的，屬於韓國文化的一部份。

不用說越南³。「去中國化」的出現，與「臺灣意識」的抬頭是高度相關的⁴。若沒有「中國化」的進行，當然就沒有「去中國化」的必要。所以，要討論「去中國化」的問題，必然的，要先釐清「中國化」在臺灣的演進。

就歷史來看，「中國化」在臺灣已有相當的時間，至晚到明鄭時期（一六六二～一六八三年）就已經是大張旗鼓的時代，這是因為之前的臺灣是由荷蘭人統治，鄭成功以中國漢族聲討回來，當然是要進行一番文化改革運動，例如提倡儒學就是其中之一⁵。後來，在清朝統治時期（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隨著移民的增加，中國文化的移植也愈來愈盛，臺灣的「中國化」進程也變快了⁶。由此看來，國民黨統治臺灣以前，臺灣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已經很深，是不容否認的事；不過，二次大戰結束之前，五十年的日本文化的浸染，也不容我們忽視。因此，在去除「異族文化」的要求下，戰後的「中國化」運動，只是延續以前的相同政策而已，對象是從原住民轉移到漢族⁷。

但是，臺灣的「同化」運動，如果以統治的目的來看，這些文化移植都有一些強制性，當時就已經有一些反抗；而隨著時間的拉長，覺醒的人愈多，反

³ 越南的文字以前也屬於漢字系統，現在已經徹底改變，蔣為文說：「當臺灣人還徬徨在中國人與臺灣人的抉擇當中，我們可以預期臺灣人對維護自己的語言並不會太堅持。越南的民族主義領導者因為有強烈的越南民族國家意識，加上反封建、反知識壟斷的潮流鼓動下，因而能破釜沉舟的對漢字進行改革、最後並用羅馬字將之取代。相形之下，臺灣人能嗎？臺獨運動者有這種覺悟嗎？多數臺獨運動者總是認為臺灣人的獨立意識不夠強，然而卻很少領導者願重視文化上“去中國化”的重要性；甚至隨那些統派人士起舞，認為推行臺語文有礙臺灣的族群和諧。事實上，臺灣人的國家認同的模糊剛好反映在他們對臺語文的曖昧態度上。」蔣為文：〈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淡江大學：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論文，2002年9月。〉收入《語言、認同與去殖民》（臺南：成功大學二〇〇五年。）

⁴ 黃俊傑說：「自從一九八七年七月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意識』從過去潛藏的狀態，如火山爆發似地一湧而出，成為後戒嚴時代臺灣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頁1。可以說是因為這個「火山」，才使得政黨輪替之後有所謂的「去中國化」政策。

⁵ 陳昭瑛：〈儒學在臺灣的移植與發展：從明鄭至日據時代〉，《臺灣儒學》，臺北：正中書局，二〇〇〇年三月。頁1~10。

⁶ 「中國化」不是局限在「儒學」，所以「去中國化」也不應局限在是否「去儒學」之上去看。本文討論「中國化」希望以較全面的文化而論，盡量不局限在某一層面。

⁷ 莊萬壽在〈臺灣原住民族人權的進路〉中說到：「臺灣原住民，是世界上唯一被中國華夏民族主義與儒教文化所覆被的南島語族。」《臺灣文化論》，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頁231。可見臺灣原住民所受「漢化」之深。原住民族因為生活與受教權的長期受限，所以民族意識一直沒有在臺灣起很大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加長，也有一些改變，所以日本人統治期所受的反抗就比較多，其中以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最有名。

抗意識會漸漸凝聚成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民族意識」，這是可想而知的現象⁸。臺灣從以前的原住民社會開始，到後來以漢族為主的漢人社會，經過許多的「同化」時期，所以會有「反同化」的「民族意識」，其實是不足為奇的事⁹。「中國化」既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站在「反同化」的立場的「反中國化」也應該是很長的歷史；但是，為何如今臺灣會有「去中國化」的問題呢？主要就是因為國民黨統治臺灣時，仍然以外來政權自居所犯的錯誤。它一直以「反攻大陸」為主要目標，再加上臺灣的社會充滿日本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使得它完全忽略臺灣長期的漢文化基礎，造成初期錯誤的文化政策。這樣，臺灣人的「民族意識」自然被激起，「反中國化」在早期就出現端倪，也就是後來被冠上「臺獨」的一批人。後來這一批人主政了，怎不會把這樣的「民族意識」拿來發洩呢？因此而有了一些「去中國化」的動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實，中國自「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用現在臺灣批評「去中國化」的標準看來，正是一種積極「去中國化」的運動。他們主張要「革新」中國文化，所以演變成「西化」，有人更主張「全盤西化」，這顯然比臺灣的「去中國化」還要更「去中國化」。當初就有所謂的「傳統派」與之唱反調，一直到國民黨統治期的臺灣，還是有以新儒家為主的人物，長期與之抗衡。只是，「五四」風潮因為戰亂而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機會，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由共產黨主政的中國，才真正掀起大的「去中國化」運動，其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而臺灣在戰後所走的路線反而是相反的，則是一種漸進的「中國化」的進程，其間與中國的「去中國化」有很密切的關係。可以說，隨著中國的「去中國化」的漸漸激烈進行，臺灣的「中國化」也更積極在推進，兩者背道而馳的現象是很值得探討的。

臺灣的中國化的進程該如何劃分呢？李亦園在一九八五年曾提出，把戰後臺灣文化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光復後以至民國三十九年，這是屏棄日本殖民文化而重建中國文化傳統的時期；第二階段是自民國四十年至民

⁸ 民族主義的興起雖然是指十九世紀歐洲與二十世紀亞非被殖民區域的獨立運動而言。但是就民族意識而言，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就會自然產生，這是原始部落也有的現象。只是囿於所見，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會要求獨立建國，再加上「民族自決」的口號也無法完全見容於強國，所以現在仍有許多民族獨立的問題存在，民族主義的興盛一時，並沒有把這問題完全解決。

⁹ 黃俊傑說：「縱觀近百餘年來，『臺灣意識』的轉折變化，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的『臺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抗爭論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反抗中共的打壓。」〈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頁 32。

國五十五年，這是切斷與大陸母文化的交往管道，而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生活傳統的時期；第三階段是自民國五十五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提出開始，以至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項建設中列入「文化建設」的計劃為止，這是官方正式以有計劃的文化運動來推動文化發展的開始；第四階段是自「文化建設」的提出以及民國七十年十一月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以至於今日，這次文化發展的行動，無論在官方或民間都趨於較活躍的時期¹⁰。這樣分法大體是不錯的，本文將在此基礎上，仔細探究。因為在中國化的進程上，有些事件不該被忽略，也應該注意到非官方的活動層面¹¹。在時間點上，本文在李亦園的文章終止年（一九八四年），延續到一九九六年為止，因為那年臺灣首任民選總統產生，基本上已經不是中國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所控制，等於宣告臺灣正式脫離中國，完成獨立運作的基本條件，所以戰後臺灣的「中國化」運動也到此告一段落¹²。中間則另以一九八七年的解除戒嚴為界，再分為兩期。以下將順序討論各進程的實際內容。

二・去日本化（1945～1950）

在這個時期，中國化的工作在各層面同時在進行：在政府部門，主要作反日語的工作，也就是推行國語運動；在另一方面，則致力於反共產黨的工作，

¹⁰ 李亦園：〈文化建設工作的若干檢討〉，《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一九八五年十月。）頁 307。另外，陳昭瑛曾依臺灣「本土化」的發展，分為三階段：反日、反西化、反中國。詳見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八年四月。頁 103。而黃俊傑則依「臺灣意識的發展」分為四個歷史階段：（一）明清時代（二）日據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三）光復後：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四）後解嚴時代：一九八七至今。詳見〈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頁 32。陳與黃之說，都是以「臺灣」為主的分法，與本文的主題雖然相反，不過卻是一體的兩面，可以參考。李的說法雖然沒有標示以「中國文化」為主題，但是以當時的時空背景，與其文內容來看，其實是可以看做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與本文所要論述的主題較接近。

¹¹ 莊英章在評李亦園的文章時就指出：「這篇論文的討論重點，僅限於機構性或有組織的活動，而未涉及非機構或組織性的活動。換言之，未包括民間或常民文化之部份。也由於如此，李教授這篇論文未能含蓋整個臺灣近三十年來的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莊英章：評〈文化建設工作的若干檢討〉，《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頁三三八～三三九。

¹² 當然，這並不是否定以後還有可能繼續「中國化」運動。因為現在在野的國民黨有「終統」的目標，一旦重新執政，還是可能進行新的「中國化」運動，甚至在成功推動與中國「終統」之後，臺灣的新的「中國化」運動也勢所難免。

所以後來在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前者是因為以前日本統治時期的「皇民化」問題，後者則是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的衝突日盛的關係。不過，就中國化的進程而言，這階段的進行並不是很激烈，成效也不太顯著。因為中國國民黨的重心還在中國，無法有效在臺灣推行各種工作的關係。

日本因為戰爭的考量，在殖民地進行「皇民化」運動，臺灣自然無法避免。雖然這個運動只是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一九四五年戰敗就正式結束，但是之前的四十幾年統治，或多或少已經有一些成果，「皇民化」運動只是為了軍事的緊張所要加強的思想控制而已¹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正式脫離日本的統治，但是不代表在文化上可以完全脫離影響。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前，當時有些人雖然主張「獨立」，例如參加「草山會議」的士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等人，但是在日本軍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臺灣的主流人物還是必須要向中國的¹⁴。這是政治的無奈，文化上卻不能有馬上改變的可能，所以為了達到「中國化」的目的，「二二八事件」之前，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國語推行委員會」就在臺北成立了¹⁵，就此可以看出中國國民黨要消除「皇民化」的態度¹⁶；更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宣佈廢止報刊雜誌的日文版，影響許多作家的創作生命¹⁷。不過，初期畢竟還是日本「皇民化」的遺跡佔優勢¹⁸。

¹³ 陳小沖：〈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引戴國輝的《臺灣與臺灣人》記小林躋造總督的一次談話說到：「臺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我國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按指臺灣人民）沒有作為日本人應該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謀私，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經濟方面暫且不論，國防上便猶如坐在火山口上。」陳孔立主編：《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頁 495。戴國輝：《臺灣與臺灣人》，東京，研文堂，一九八〇年，頁 208。

¹⁴ 「草山會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召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命令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八月三十一日，林獻堂、許丙、辜振甫就到上海迎接陳儀上任。

¹⁵ 當初是隸屬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¹⁶ 陳培豐研究日本在臺灣的同化運動時就說：「『同化』最主要的手段—國語教育」，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 44。國民黨所採取顯然也是這樣的步驟。

¹⁷ 《光復後文壇大事紀要》，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一九九五年六月二版。頁 9。

¹⁸ 所以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新生報》社論竟說：「完全是日本教育迴光返照，日本思想的餘毒從中作祟。」林玉体：《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二〇〇三年九月）頁 188 引。這樣的批評當然只說對一半，因為日本統治者在統治後期已經在「貴族院」安排有臺灣人的席位，如林獻堂，顯然對臺灣的統治有向公平性前進的趨勢，至少有拉攏的目的，不再只是一味高壓統治，對於臺灣人的民主的追求動機有正加強的作用。但是，後來日本離開了，中國來接收臺灣，臺灣人滿心期待自己終於可以更公平地被「祖國」對待，可是事實卻是更不公平地被對待，「二二八事件」就在這樣的民主矛盾下發生了。

這是因為文化的革新需要時間，單就語言的學習而言，一般人若非按部就班學習，不經過十年的教化，民間是不能有立竿見影的成效的；再加上戰後的國民政府馬上忙於應付內戰問題，對於臺灣的教育根本無法用心，所以成效更是有限。文化上的中國化進程，當然是無法有效進行了。要等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完全遷移到臺灣以後，才有一連串更加強的「反日」的「中國化」運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取代國民黨在中國的政權，但是一九五〇年國民黨軍政人員才陸續移到臺灣，所以，才有比較明確的政策。相對於「反日」的「中國化」運動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更加強，學術文化上，國民政府正式移轉到臺灣，也帶來一批當年「反中國文化」最烈的知識份子當學術領導，這批人的影響力，卻是主導臺灣初期「去中國化」的主要力量。由當初一批反對者的言論中可以看出，相對於上層所厚愛的學術領導，反對者的力量在初期是微乎其微的，以徐復觀為例，他在一九五〇年批評中共政權時，還是出現以下這樣很「五四」的文字：

中共雖然痛恨中國文化為封建文化，正在作斬草除根的工作；但中國文化，對於共產黨的活動，在某些地方也無形的發生了支持的作用。第一、儒家政治思想從來不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們承認階級壓迫為合理。因而大同世界，是由人性平等，到社會平等的世界，不像《理想國》之由不同的人性階層所堆砌起來的。所以「均」與「平」乃中國一貫的政治理想。而「打抱不平」幾乎成為民族感情的重要部份。第二、儒家、陰陽家都把政治的範圍放在「天下」之內，國則僅為家與天下之一過程。因此，中國的智勢份子，缺少近代的國家觀念。第三、中國的智識份子之避忌生產勞動，這只是後來的一種病態。中國文化，原來對於勞動是有一個很親切的態度的。《書經·無逸篇》所提出的「稼穡之艱難」的觀念，成為統治者所應必具的觀念。而《詩》三百，多半是勞人思婦之詞。這和希臘的只歌頌英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因為他們視勞動為奴隸之事，不值得歌頌。這些，都是使中共容易得所假借，並且更易使社會對中共存一種幻想。¹⁹

¹⁹ 徐復觀：〈論中共政權〉，《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頁一〇八。原刊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民主評論》。

這當然是很諷刺性的說法。徐復觀是後來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與自由主義者論戰最激烈的人物。他在一九五〇年還未真正踏入學術界，所以這段文字可以看作對中國文化比較公允的批評²⁰。「五四」運動的人物批判傳統文化，也介紹西方文化，卻演變成「全盤西化」的風潮。不論徐復觀的目的如何，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那時反中國文化的勢力是在主流地位的，所以像徐復觀這樣的中國文化維護者，在批評中共政權的非法性時，都要用這樣「矛盾」的技巧來反抗反傳統派。雖然有人認為這段時期是「政府真正開始致力於『中國意識』理論的建立」²¹，但是，這只有就政治面而言，也就是以「反日」為主的「中國化」；另外，因為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一意以「反攻大陸」為目標，若不把「祖國」的觀念灌輸給臺灣人，就無法有「解救同胞」的回應。因此這階段的中國化重點，就是在「民族精神教育」的推行與語言的改變上²²。

三・西化與中國化的交戰（1951～1966）

以胡適為首的北大派學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實際主掌臺灣學術界。雖然初時胡適並不在臺灣²³，在當時的「五四」精神的延續下，臺灣學術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批評多於接受，黃俊傑曾總結這現象說到：

總而言之，近七十多年來的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在新舊衝突、中西激盪的歷史背景下，學者勇於對新知作「橫的移植」，怯於對舊學作「縱的繼承」；而在研究方向與題材上，也傾向重視實證研究，而忽視了價值研究。戰後臺灣的人文學術，深受民國初年以來這兩項人文學術研究趨勢的影響。²⁴

²⁰ 徐復觀正式進入學術界，是在一九五四年成為臺灣省立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的正式教授。而比較積極投入中國文化的研究與推廣，應該要從一九五五年進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當教授兼系主任開始。

²¹ 黃國昌：《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頁 23。

²² 關於此點可以參考莊萬壽：〈解構中華國族主義與反思臺灣國民思想〉，《臺灣文化論》，頁 254～255。

²³ 傅斯年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擔任臺大校長，後繼者是錢思亮。胡適雖然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才就任中研院院長，但是中研院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選出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到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在臺灣才舉行第二次院士會議。之前的院長是朱家驊，只是代理性質。胡適在位期間，才是中研院在臺灣正常運作的時期。胡適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後繼者是王世杰，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才由時任臺大校長的錢思亮繼任。

²⁴ 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儒家思想的研究〉，《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三年一月。頁 279。

這種延續性的學術風氣，對於「去中國化」是有很明顯作用的。當然，學術上的所謂「去中國化」研究趨向，也非全不對傳統文化有所接觸，只是在方向上有所偏廢就是了。所偏的就是在「民主」、「科學」這兩項「五四」口號上；所廢的就是在「價值」的認同上。因此，臺灣的整體文化上：科技是學術的主流，經濟是民生的重點，所謂「價值」則由國家所主控。所以文化上的偏廢，其實與中國文化的精髓是相去甚遠的。

但是相對於基礎教育的進行，卻離不開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而這些又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傳統，顯見政府方面對於傳統文化的可利用之處，並未因西化派的得勢而完全放棄²⁵。直到時間進入一九五八年以後，由於傳統派的《文化宣言》的發表，等於是結合了臺灣與香港、美國的傳統派力量向西化派全面宣戰²⁶；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二十三日的「金門炮戰」發生以後，也使得國民政府的反攻希望正式破滅²⁷，在臺灣的「中國化」運動才有更積極的政策。不論是「反日」或「反西化」的「中國化」運動，這段時間的成效仍然都有限，可見文化革新運動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完成的。就算是政府方面的行動也是如此，再如何強迫，沒有其它因素，如教育、經濟的有效輔助是無法推動的，因為教育的普及，總是在大家吃得飽的情況下才能漸漸完成的。這時期的臺灣，承戰後積敗之後，教育無法普及是必然的，文化的革新當然是緩慢的。不過，以新儒家為主的傳統派，在這個階段已經是積極與西化派在抗衡，其中以徐復觀最具戰鬥性，為以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做了開基的工作²⁸。所以，就更全面的中國化而言，得要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臺灣推動以後²⁹，也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才算真的大力推行「中國自覺意識」的運動。

²⁵ 詳見黃俊傑：〈儒家傳統與二十一世紀的展望〉，《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頁 165~188。原刊於沈清松主編：《詮釋與創造：傳統中國文化及其未來發展》，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一九九五年。頁 523~548。另外，一九五六年，所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正式成為高中生必讀之書，其內容也就是以儒家的《四書》為主。

²⁶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就由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四人聯名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評論》第九卷第一期。

²⁷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美聯合公報〉：「中華民國政府以恢復中國本土民眾的自由為神聖使命……為達成這個使命，在原則上的方法是適用三民主義而不在使用武力。」楊碧川：《臺灣現代史年表》，臺北：一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頁 79 引。案：當初是由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lles, John Foster, 1953~1959 年美國國務卿）與蔣介石領銜發表。

²⁸ 這裡指非官方的文化復興運動。

²⁹ 一九六七年七月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在此之前，雖然在一九六二年成立「孔孟學會」，但是它的作用並不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原因在於後者一直是以蔣介石為主席，而且成立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功能性較強。

「中國化」的發展出現大的轉折，就在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戰」之後。「八二三炮戰」之後，使得臺灣的國民黨無法再有效推動「反攻大陸」的政策³⁰，但是，實際上，這次炮戰恐怕也打碎了分裂臺灣與中國的企圖³¹。就因為國民黨的政策轉向，所以「中國化」也加速了；因為臺灣和中國分不開，所以獨立發展的空間也就減少了。這樣，就使臺灣的中國化進程加快了，再加上後來的共產黨的政策，使得臺灣在這一階段的中國化，達到空前快速的發展，其中又以「雷震案」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影響最大。

《自由中國》刊出「祝壽專刊」後，被扣上「思想毒素」的帽子³²，所以它在文化上對傳統派的攻擊就稍緩和了一些。到一九六〇年「雷震案」發生，文化活動因為這一政治事件又一轉折。雷震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被捕，《自由中國》也隨著關閉。《自由中國》一向比較專注於臺灣的民主運動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並非重點³³。所以，當一九六〇年《自由中國》被關閉後，傳統派在文化論戰上並未因此就得到最後的勝利，頂多只是得到喘息的機會而已。一九六一年，徐復觀發表一篇〈五十年來的中國學術文化〉³⁴，批評了戰後的臺灣，在學術研究上的缺失說到：

傅斯年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搶搬到臺灣，並搶救了一部分學

³⁰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有幾個要點：1 取消對中國大陸之禁運 2 中共加入聯合國 3 承認 Republic of Taiwan 使其在聯大獲有席位 4 擴大安理會使中日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 5 重申美國協防臺灣的義務不變 6 中華民國軍隊退出金門馬祖 7 「臺灣國」成立後在臺的大陸「難民」如願離去應予協助解決。以上見楊碧川：《臺灣現代史年表》，頁 81 引。而 George Keer 的《被出賣的臺灣》記有〈康隆報告〉的以下一段話：「假如臺灣的領導者與共產黨妥協，美國的立場一定極為窘迫，她需要緊急作決定是否干涉，以保障臺灣人的自決權。」George Keer 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臺北：前衛，二〇〇七年十一月。頁 412 引〈美國國會紀錄〉(1960 年再版)的〈康隆報告〉文。可見美國當時既不希望中、臺合一，也不希望中、臺持續開戰。國民黨一直很依賴美國，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明正言順「反攻大陸」了。

³¹ Jay Taylor 的《蔣經國傳》記到，蔣介石在炮戰期間傳話給周恩來說，若解放軍再不停止砲擊，他將不得不聽美國人的——撤出金門和馬祖，屆時時間一久，中國就有分裂之虞。中國不久就宣佈「單打雙不打」的新政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月，林添貴譯。頁 268。可見美國不願國民黨盤據金、馬的意向。而蔣介石與毛澤東各有盤算，期待將來打敗對方，真正統一天下，所以這場炮戰就這樣不了了之。

³² 雷震：《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頁 109~145。

³³ 據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統計，共有 1297 篇關於臺灣民主憲政者。

³⁴ 原刊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的《聯合報》。今收於《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二冊，頁一四八~一五七。

人到臺灣大學，這是他很大的功勞，所以談臺灣今日的學術文化，不能不重視這兩個學術機構。……可惜他死得太快了。十年以來，這批學人若從學術的思想性來說，有點像寺院裡的尼姑，高貴而沒有生育。胡適回臺長中央研究院，頗要有所作為，但他自己似乎還憧憬於他的民國十年前後的黃金歲月，而不知那些歲月已經是不留情的溜走了。他所選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人文學科方面，似乎只注重做了若干整理資料，校對若干文獻的學者。³⁵

這是徐復觀一向對胡適派學人的敵意，雖然批評有些刻薄，但是不算新鮮。可貴的是，他接下來所比較的一番話：

對於中國學問真有研究而帶有思想性的學人，如方東美、錢穆、陳康、唐君毅、牟宗三諸氏，一概都採取排斥的態度。其實真正繼續五四時代精神的，決不是他們，而是以雷震、殷海光為中心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他們的主張不論贊成與否，但是具體、明朗、有生氣、敢對現實負責，這一枝算隨雷案之發生而告一結束了。³⁶

這是「雷震案」發生以後所發表的文章。這裡可以看出，他雖然和《自由中國》有一些文化上的論爭，但是對於他們的「具體、明朗、有生氣、敢對現實負責」的意見卻很肯定，所以才說他們是「真正繼續五四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徐復觀對於中研院史語所與臺大的學風的不滿所生的批評，當然也包括這裡所說的「殷海光」，但是他認為不影響他對《自由中國》的評價。不過，《自由中國》的一批人最後都成為民主烈士，為臺灣的民主付出代價。

這樣的文化鬥爭，卻沒有因為雷案而結束，以《文星》為主的論爭卻更激烈，一直延燒到一九六五年《文星》停刊。《文星》雜誌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才創刊³⁷，在文化觀念上卻是和胡適、殷海光等「西化」思想一般，所以當然是以反傳統文化為主。最激烈的導火線，應該算是一九六二年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³⁸。傳統派與《文星》這樣的文化爭論，最後被稱為「文化

³⁵ 《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二冊，頁一五五～一五六。

³⁶ 《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二冊，頁一五六。

³⁷ 葉明勳任發行人，蕭孟能任社長。初期由何凡主編，第四十九期起由李敖主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停刊（十六卷八期）。

³⁸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文星》第52期。

論戰」。其實，以徐復觀為主的傳統派學者，在一九五〇年以後，幾乎就在文化上與以胡適為首的西化派學者產生明顯的對立與論戰，所以，要把一九六〇年以後與《文星》之間的「文化罵戰」³⁹才稱為「文化論戰」並不是很恰當。

文化上的反共，是在一九六〇年以後的事，臺灣政府開始有計劃地進行文化推廣運動，名之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在學術上，初期是受「五四」人物與遺風影響所以並不重視傳統中國文化；而在政策上，是因為專制的與反共的方針，所以對於文化發展是偏於軍事與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沒有很積極的文化政策。整體上，一九六〇年以後，臺灣的政治被壓制下來了，文化的爭論雖然尚未平息，但是有了一些改變⁴⁰。

四・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1966～1976）

徐復觀曾在一九六六年發表文章說：

臺灣數年以來，以一個書店和雜誌為中心，對自己的文化和研究自己文化的少數人展開了史無前例的誣蔑、陷害，把孔子比作西門慶、魏忠賢，把讀中國書的人說是義和團，風氣所及，凡是以客觀態度研究中國文化而得到平實結論的人，都成為社會嘲笑指摘的對象。⁴¹

後來，因為臺灣在一九六七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⁴²，這情況才有了改變，徐復觀說明了其中的主因：

³⁹ 徐復觀於一九七〇年二月發表〈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記到：「後來《文星》的文化『罵戰』開始了，戰火逐漸漫延到我身上。」，《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四月。頁 176。

⁴⁰ 一九六〇年四月「孔孟學會」成立（一九六一年二月陳立夫由美返臺，開始掌「孔孟學會」。）；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去世；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彭明敏等人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一九六五年四月「臺灣文學獎」成立；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國成立「文革小組」，八月發動文化大革命。

⁴¹ 徐復觀：〈成立中國文化節感言〉，《徐復觀文存》，頁 169。原刊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新天地》五卷十期。

⁴²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由於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中華傳統文化破壞嚴重。為了保護中華文化，1966 年 11 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啓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 11 月 12 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1967 年）七月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蔣介石任會長，運動即在臺灣和海外推行。

在我們少數研究中國文化的人，被臺灣的一種特殊勢力圍攻、誣陷、困擾的時候，現在因大陸上利用紅衛兵徹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而激起此間的反省，由總統蔣公決定以中山先生的誕辰為中國文化復興節，其意義的重大，和我們私人內心的慶幸是難以形容的。⁴³

可以說，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就沒有臺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若沒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會因為西化派的關係，使臺灣的「中國化」更緩慢。當然，在文化復興運動之前，中國化的進行就沒有斷過。所差別的，現在是由蔣介石親自領軍，要向傳統中國文化取經，以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領軍的文化大革命別一苗頭。這時的新儒家當然很欣慰，因為這等於是向西化派宣佈政府已經放棄西化的可能，長期的孤軍奮鬥總算有了轉機⁴⁴。可是諷刺的是，徐復觀卻在一九六九年以後被當局逼得移食香江，這對於長期在臺灣為中華文化護根的人，實在是最難堪之情⁴⁵。

而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也對臺灣的中國化產生影響。文化復興運動雖然大張旗鼓地在進行，但是國際的現實卻告訴臺灣，這樣的文化復興運動，也無法真正「反攻大陸」，而且連基本的「反共」都已經無法得到國際認同，「復興中華文化」與「文化大革命」的對比意義在哪裡呢？這些疑慮，自然會使「臺灣意識」加溫，後來的「本土化」運動興起與此應該有關係。

五·中國化的轉進（1976～1996）

這是中國化的高峰期，但是「物極必反」，所以高峰期也代表著開始走下坡。

⁴³ 徐復觀：〈成立中國文化節感言〉，《徐復觀文存》，頁 170。

⁴⁴ 徐復觀曾經回憶說：「其後針對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臺灣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是政治的反應，並非基於文化上的反省自覺，因此根基不太穩固。不過，『文化復興』的口號也帶來了好處，使得原是反對中國文化的人，一夜之間又贊成了，這對整個社會氣氛來說也有所影響，目前臺灣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穩住中國文化，這總是好的。」林鎮國·廖仁義·高大鵬：〈擎起這把香火——當代思想的俯視〉，《中國時報》一九八〇年八月聯合採訪。收入徐復觀：《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頁 409~410。

⁴⁵ 徐復觀在一九六九年從東海大學退休，本來想在臺北定居，有許多學校就想找他兼課，如輔大、臺大，卻因為高層打壓而不果。詳見徐復觀：〈從「哈哈亭」向「真人」的呼喚〉，《徐復觀最後雜文》，（臺北：時報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頁 15~16。而牟宗三則早在此之前就被懷疑「思想有問題」，而比徐復觀更早移居香港。

有人認為，戰後「本土化運動」的先鋒是「新儒家」，因為他們要捍衛已經「臺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⁴⁶。但是，這樣的感情是建立在對「西化派」的反抗之上；另一方面，他們新儒家可以和許多臺灣人合作，不是因為喜歡國民黨的中國代表權，而是更討厭共產黨的破壞中國。所以在對中國文化的問題上，更不能因此把「本土化」與臺灣文化的獨立性切割。國民黨到臺灣之前，中國文化在臺灣化的過程，沒有與政治產生很深的關係，是以民間的自發性行為為主的。後來的發展，是以「反抗」的意識為主導，才有所謂「本土化」的產生⁴⁷。最初的鄭氏王朝以「反清復明」為目標，是為了反抗異族的統治對文化的迫害；後來清人統治臺灣，是採取放任的文化政策為主，甚至限制中國人來臺灣，來臺灣的人也是偷渡而來的為多，仍是「反清」因素為主；後來因為認識到臺灣在中國海防上的重要性，所以才積極建設臺灣；不過，也只是注重在經濟與軍事上的發展，而且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被日本所要求而割讓了；日本統治期間，又有以反日為主的文化運動，仍是建立在「反」的意識上；國民黨來了，若非反對國民黨的西化派主流，也就沒有傳統派的「維護中國文化」言論，若無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沒有國民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些仍然是建立在「反」的意識之上。

不過，隨著蔣經國的務實風格，臺灣的文化推展，伴隨著經濟發展而有了大發展的契機。本土化的興起對中國化有何影響？真正的「本土化」，不該只是為「反」而起的文化運動，徐復觀說的好：「鄉邦的文獻工作即是復興中華文化的工作。」⁴⁸對於臺灣文化而言也是如此。以前的「本土化」根本上是建立在「中國」的文獻工作上的，對於「臺灣」的文獻工作是微不足道的，這哪裡算是「復興中華文化」呢？若非有意把臺灣排除在「中華文化」之外，就是不甚真心要「復興中華文化」，所以才有此遺漏。當然，更有可能是怕臺灣民族主義興起，危害到「反攻大陸」的大業。不論如何，就徐復觀的標準看來，這樣都沒有達到「復興中華文化」的目標⁴⁹。

⁴⁶ 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八年四月。頁 124~125。

⁴⁷ 如前引黃俊傑所說的「臺灣意識的發展階段」。

⁴⁸ 徐復觀著，曹永洋編：《徐復觀文存》，（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六月。）頁 324。這是發表於一九六八年的《湖北文獻》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⁴⁹ 徐復觀在一九七七年就說過：「自一九七〇年以來，臺灣在經濟上有了畸形的發展，在文化上也出現了轉形的蛻化。……所謂『轉形』，是指在中華文化復興的虛偽口號下，瘋狂地把中國人的

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去世，李登輝成為繼任總統。本土化的運動愈來愈明顯。其實就正面來看，它只是要填補臺灣文化史被遺缺的部份而已。雖然已經有些慢，但是比起沒有做是好多了。相反的，中國化的工作經過文化復興運動的二十年推動，幾乎已經走到盡頭。其實，只是形式主義的「文化復興」，終不是長久之路，所以走到盡頭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中國化的方向是到該轉移的時候了⁵⁰。

隨著開放探親與解嚴，「反共」的口號等於也隨著「反攻大陸」消失在現實之中而漸漸走入歷史，所以中國化的轉向就和「投共」、「親共」接上新關係。雖然這樣的轉變對蔣家父子不啻是一齣諷刺的鬧劇，但是為了和臺灣意識的抬頭別苗頭，這樣的轉向恐怕是國民黨唯一有效而快速的反擊之道，因此也顧不到領袖的訓示與黨的宗旨，更別說對於人民的誠信問題。

這時期，商業行為當然還是漸漸居於領導地位。商業文化的取向是經濟，根本不受政治道德的約束，所以當中國化轉向親共與投共時，以商人利益為訴求可以掩蓋多數人民的政治道德問題。臺灣不該因為短期的經濟利益而犧牲政治道德標準，「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臺灣的政治人物若不能以孔子的這句話警惕自己，終會自食惡果。

臺灣身為島國，眼光應該在全世界。中國的崛起可能是二十一世紀重要的商業大事，但是進入二十二世紀時呢？商人可以搶短期利益，但是政治人物與人民不能犧牲長期利益，商人不該以之為賭注。若商人有此賣國行為，人民要提出反制行動，政府更要有懲罰規範。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以國民黨的候選人身份，當選臺灣第一任民選總統，這等於正式宣示了跟中國的政治關係的斷絕。不過，文化上的關係當然不會跟著完全斷絕，只是，臺灣的政治愈正常，當然本國意識就愈凸顯，中國化的推動不但已經很難進一步，更是要合理地檢討臺灣歷史上的中國化現象，所以才有「去中國化」的爭議產生⁵¹。這將成為未來幾十年臺灣文化史上的新課題，直到臺灣重新被世界強權所承認，才会有更肯定的方向。

心靈澈底出賣為外國人的心靈而言。對此一趨向的反抗，表現為若干年輕人所提倡的『鄉土文學』。」詳見徐復觀：〈從「瞎遊」向「謎遊」〉，《徐復觀雜文一憶往事》（臺北：時報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四月）頁134。

⁵⁰ 蔣經國也曾公開說自己也算是臺灣人。

⁵¹ 其實「去中國化」的一些行動也有其合理之處，例如：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改名「臺灣中油」。「中國造船公司」更名為臺灣國際造船公司。中華郵政改名臺灣郵政。這些名稱不改，在日漸全球化的經濟上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

六・結語

「中國化」本來是中國人到一個地區時所影響到的自然的文化演變，無需大驚小怪；但是當有政治力的強制性介入時，打壓了既有文化，就會產生反彈，「去中國化」就是對這種不合理所做的反彈⁵²。「中國化」與「西化」、「馬克思化」等等，在宣傳上都有一定的共通義，基本上都是被過度誇大的「同化」理想。因為過度誇大，所以政治力就會過度強勢介入推動；因為過度誇大，所以當遭受抵抗時就會太激烈反彈。對於文化史的演化過程來說，這些都是不幸的悲劇。

戰後臺灣的整體文化走向，內部其實一直是向多元化在走的，這與官方中國化的單一性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最終必需有所調整，也是合理的現象。相對的，有些文化雖然一直是向受政治的強力壓制，但是在一般民間自然有一股「伏流」在。「文化伏流」是政治力無法完全掌控的無形力量，它是經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而在民間根深柢固的存在。徐復觀曾說：「孔子思想在中國歷史中常保持一種『伏流』的狀態。」⁵³就目前中國正在全力推展「孔子學院」的情況看來⁵⁴，徐復觀的說法是很符合的。因為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他們是如何想徹底打擊孔子？恐怕是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現在的「孔子學院」卻是希望透過漢語教學為主，經濟利益為輔，將孔子搬來替中國文化做傳媒，兩者之間的政治操縱不是很明顯嗎？其中的褒與貶都是企圖透過誇大，來達到它的政治目的而已，不是真正對文化的同情。

文化的形成，如果要靠政治力強制執行，終非長久之計；文化的推廣，當然要因勢利導，才能夠事半功倍。但是，臺灣文化因為不斷受統治者的不當干

⁵² 黃俊傑總結地說：「在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前，在政治力凌駕一切的體制下，臺灣文化充滿生命力的『多元主體性』一直處於被壓抑、鬱而不彰之狀態中。自從戒嚴令廢除之後，最近 7 年多以來，『政治主體』以外各種以前處於沉睡狀態中的『社會主體』、『經濟主體』等，紛紛甦醒……臺灣現階段的政治鬥爭與社會衝突，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以上所說的文化轉型的某種外延表現。」黃俊傑：〈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新文化：內涵問題與前瞻〉，《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頁 243。

⁵³ 徐復觀：〈中國文化的伏流〉，《徐復觀文錄一（二）文化》，臺北：環宇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一月，頁一一四。

⁵⁴ 依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小組辦公室」網站所公佈的數目，到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為止，共開有一百四十一所「孔子學院」，計有亞洲：五十四所；歐洲：四十六所；非洲：十一所；大洋洲：四所；北美洲：二十七所。

涉，所以文化上雖然是多元的，卻是血淚交織的歷史所塑造的⁵⁵。在一九九六年正式進入民主國家之後，臺灣的自由發展度提高，必定會有符合民主的多元文化形成。我不認為以前強勢的「中國化」是完全正確的，也不認為完全的「去中國化」是可行的。文化仍是植根於民間的，它是多數人長期以來所認同的一種行為模式，也許它是動態的，但是卻不是被動的，更不是強迫的。在自然的運動下所形成的文化，才能真具本土特色，也才能可大可久。執政者真有心要塑造本土文化，不能只在消滅已有的外來文化上；要更仔細去觀察已有的文化有何擴展空間，再來幫忙推展；外來文化有不合理或不合時宜的地方，自然會被人民所轉化或淘汰，不必靠政府來當壞人。誠如黃俊傑所說的：「展望未來，『臺灣意識』應該從抗爭論述轉化為文化論述，才是一個較為健康的發展方向，庶幾『臺灣意識』才能成為二十一世紀新的世界秩序與海峽兩岸關係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⁵⁶所有的對立觀念是先天就有的，所以當然不能期待沒有對立；但是站在尊重的立場，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場來看，對立應該是並存的。中國與臺灣在二十世紀的對立，由於領導人選擇勢不兩立，造成無數的無辜百姓犧牲，其價值幾乎是零，我們不該反省嗎？本文希望夠過這樣的歷史回顧，讓新時代的文化觀在臺灣拓展，不要在臺灣產生無謂的衝突，先尊重彼此的異見，才能真正迎向地球村的世界新文化史。

⁵⁵ 特別是對原住民族而言。

⁵⁶ 〈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頁32。

主要參考書目

1.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市：聯經，2004年。
2.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市：時報文化，1986年。
3. 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臺北：聯經，1999年。
4. 李怡，《知識分子與中國》，臺北市：遠流，1989年。
5. 李澤厚，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臺北市：風雲時代，1989年。
6. 李世家，《近期臺灣哲學》，臺北市：林鬱出版，1992年初版。
7. 李筱峰，《進出歷史》，臺北：稻香，1992年。
8. 沈清松，《臺灣精神與文化發展》，臺北市：臺灣商務，2001年。
9. 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
10. 林安梧，《當代新儒家哲學史論》，臺北市：文海基金會，1996年初版。
11.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市：臺原出版發行，1993年。
12. 莊萬壽，《臺灣的文學》，臺北：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第一版。
13. 莊萬壽，《臺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臺北市：玉山社出版，2003年。
14. 莊萬壽，《中國論》，臺北市：玉山社出版，1996年。
15. 莊萬壽，《臺灣論》，臺北市：玉山社出版，1996年。
16. 莊萬壽，《史通通論》，臺北：萬卷樓，2009年。
17. 莊萬壽主編，《臺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臺北市：前衛出版，2002年。
18. 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19. 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臺北市：牧童，1977年。
20. 陳序經，《文化學概觀》，上海：商務，1947年。
21. 陳勝長，《考證與反思》，臺北市：東大，1995年。
22. 陳鼓應，《容忍與瞭解》，臺北市：環宇，1971年。
23. 陳鼓應，《言論廣場》，臺北市：遠景，1979年，三版。
24.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市：遠景，1978年。
25.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市：全民，1955年。
26. 郭齊勇，《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臺北市：遠流，1990年。
27.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臺北市：自立晚報，1990年第一版。
28. 張忠棟等人，《什麼是自由主義》，臺北市：唐山，1999年，初版。
29. 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臺北市：東大出版，三民，1993年。
30.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市：喜瑪拉雅基金會，2001年。
31. 黃俊傑，《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臺北市：喜瑪拉雅基金會，

2002 年。

32. 黃俊傑，《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北市：東大出版，1983 年。
33. 黃俊傑，《儒學與現代臺灣》，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34. 黃俊傑，《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35. 黃俊傑，《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6 年。
36. 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
37.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正中，2000 年。
38. 曾品滄，許瑞浩訪問；曾品滄記錄，《一九六〇年代的獨立運動：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2004 年。
39. 楊祖漢主編，《儒學與當今世界》，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40.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香，1996 年。
41. 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翠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市：遠流，1994 年。
42. 瞿海源等著，《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桂冠，2002 年初版。
43.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縣：稻鄉，2005 年。
44. 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臺北市：前衛，2008 年。

